

【文化视点】

毛泽东的文化选择及其对中国文化方向的影响

李彦青¹ 贾丽云²

(1.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2.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旗帜引领方向,道路关乎命运。正确的方向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根基。作为推动中国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毛泽东针对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派和党内教条主义的文化主张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念,认为文化的发展最终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大贡献。毛泽东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设计对我国文化建设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即使在党情、国情、世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文化选择;文化方向;文化需求

DOI:10.13736/j.cnki.zgsjzswdxxb.2014.0097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4)08-0021-04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积极推动者。就推动中国文化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而言,毛泽东的文化选择和文化设计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因此是科学的、可行的。这已经为今天文化发展繁荣的事实所证明。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毛泽东设计了中国文化怎样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能否继续作为我们今天高高举起的旗帜?本文拟从毛泽东文化选择的背景、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及其对今天文化建设的指导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近代的文化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华民族在陷入了深刻的民族危机的同时,也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危机,中国在救亡图存的同时,也面临着艰难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从鸦片战争开始,历经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之后的文化论争,各种观点纷至沓来。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大致有文化保守主义、西化派

和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基本的文化取向。

最早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是由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系统阐述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曾受到严复的严厉批判,但以后仍有改头换面的中体西用论出现。张之洞之后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即是梁漱溟。梁漱溟把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看作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路向”,梁漱溟认为,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①,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②。梁漱溟这种全盘肯定儒家思想的理论,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对,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的大论战。

西化派的文化选择始于严复。他从进化论出发,肯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并针对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主张,认为中国文化应“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③,从而开了西化派文化选择的先河。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早期也基本持此观点,而最著名的西化论者当属胡适。他从资本主义文化出发去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胡适的失误就在于他由强调资本主义文化相

[作者简介]李彦青(1965-),男,河北肃宁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贾丽云(1964-),女,河北肃宁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西柏坡精神。

^{①②}《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4,525页。

^③《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对于封建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走向片面美化资本主义文化,完全漠视其弊端,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则完全抹杀其精华的一面。

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文化选择问题上产生了第三种方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由宣传“德先生”和“赛先生”,转而进一步主张和宣传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文化选择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二、毛泽东对近代以来文化选择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在设计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进行了科学总结,对保守主义、西化派和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文化选择都进行了有分析的批判。

毛泽东坚决反对保守主义的文化选择。他认为,封建主义文化或半封建主义文化,是封建的、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所以,从晚清到国民党时期的一切守旧派人物无不赞同保留封建旧文化。而在毛泽东看来,正因为封建主义文化是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因此必须要革除。他说:“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①北洋军阀时期,“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五四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有“极大的功绩”^③。很明显,在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继承并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精神的。但毛

泽东的先进性较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又前进了一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往往把封建主义的文化和封建社会的文化等同起来,不区分精华、糟粕,不承认封建社会文化的继承价值,而毛泽东则对其作了具体分析,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文化观的一大进步。

毛泽东对西化派的文化选择同样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首先,他肯定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输入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④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他把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称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⑤。其次,他认为中国人通过学习资本主义文化以建设现代国家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的变化,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因为这些原因,“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⑥。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选择必然要让位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选择。虽然如此,毛泽东并未把资本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同等看待,仍认为能够成为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可能的“盟员”。

在对资本主义文化选择作具体分析的同时,毛泽东又对西化派的文化选择做了方法上的批判,指出它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⑦。形式主义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普遍思想特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①④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696-697,697页。

②③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1,83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①“全盘西化”的主张就是胡适等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使用形式主义方法的一个结果。

除了对保守主义和西化派的文化选择进行分析与批判之外,毛泽东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在文化选择上所犯的错误的批评。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只会背诵马恩列斯著作的词句,毛泽东指出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②。

三、毛泽东的文化选择

历史一再表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作基础,而这个基础则来源于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文化观。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保守主义、西化派,到早期共产党人的教条主义,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设计,才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

毛泽东认为,并不是因为否定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就能够立即建立起来。他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性质上不能不说仍然是一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③正因为遵循了这样的基本原理,所以毛泽东说:“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④“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

‘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⑤

在对新文化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之后,毛泽东对这种新文化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⑥这种新文化的特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其直接的思想渊源是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提法。毛泽东一生崇拜鲁迅,受鲁迅的影响极大,对鲁迅的评价也极高,认为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⑦。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毛泽东并不是一概排外的民粹主义者,相反,他认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⑧。这里之所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指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有别于西方价值观体系,即以“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毛泽东对“科学的”作了如下解释:“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⑨就是说,这种新文化是反封建、反愚昧和反迷信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⑩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则提出一方面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同时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要反对颂古非今,反对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只有如此,才能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这里已经蕴含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832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695,698,698,698,706-707,707,707页。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之所以是大众的,这是由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所决定的,因而这种文化又是“民主的”,即这种文化必须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必须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他要求“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①。

四、毛泽东的文化选择根本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新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文化?这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问题之一。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这一著名论断,从此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艺术的根本性质。

在1942年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工作对象问题,就是艺术作品给谁看的问题”^②。他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③这是毛泽东对“大众化”的通俗解释,也是他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理念指导文艺创作实践的一次尝试。文艺创作乃至文化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在5月23日的结论中,他说:“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④在他看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⑤。文艺要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这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为他们的精神利益服务,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他说,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群众所需要、所易于接受的文艺,就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特别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使人民群众受到感染,从而“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⑥。为了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同他们交朋友”,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的状况,

研究他们的面貌和他们的心理,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一句话,就是要文艺家了解服务的对象,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发现美、创造美,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美为工农兵服务。

在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核心问题之后,毛泽东又围绕着“提高”与“普及”,着重解决了如何服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因此,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是人民的提高,因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⑦。此外,在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是从人民的精神利益出发的。例如写“暴露”,他主张对人民群众的缺点,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不是不能写,“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⑧,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作斗争,而不能抱着讽刺、挖苦的态度,为展现群众的愚昧和落后,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

到了和平建设时期,包括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需求在内的精神需要更为突出,且越来越多样化。为适应这种情况,毛泽东先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关于文化艺术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为人民“精神利益”服务的发展,更是实现“大众的”文化的深刻体现。

当然,建国之后,由于我们对毛泽东文化选择理解和执行上的偏差,使得对“工农兵”的理解越来越窄,文化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生活,使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指导文化艺术方面的失误,主要是因为他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其主客观原因是复杂的。我们不能把它与完整科学的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李颖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9,851,853,857,861,863,871-872页。